

新观察·文体探微

微型小说:

短叙事如何反映大时代

□安 谅 高 健

微型小说以“小体量”承载“大时代”，既是时代的“切片”，亦是人性的“标本”。探讨其文体特性，不仅关乎这一文体如何突破“易写难工”的桎梏，更在于厘清短叙事如何精准捕捉时代脉搏、展开深刻思考。本期两位作家的对话，深入剖析了微型小说的文体优势与发展路径，彰显了文体探对文学回应时代的重要意义。

以“小体量”承载“大时代”

安 谅：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加速的当代社会，微型小说如何以“小体量”承载“大时代”？从事微型小说创作的人，其实有意或无意地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作为小说的创作者，尤其是微型小说创作者，更应该敏锐地发现时光中的碎片，似一朵浪花，也像一茎细草，折射出的某种光色，仿佛是万物推出的代表，在滚滚浪潮中显出别样的风致。创作者要以自己的视角和文字，将这些碎片艺术化地呈现出来，便是一种对时光的撷取和留存。

我的微型小说创作或断或续地写了40余年。一是源于对文学的痴爱，二是因为工作繁忙，最后只能选择以微型小说为主项，挤出时间来创作。三是虽然微型小说精、小、短，但具有足够的艺术张力。

高 健：许多从事这一文体的作者都是因为微型小说体量小，写作不会占用过多的连续性时间。但微型小说虽然容易上手，想要写好却很难，这就是所谓的“易写难工”。现实的情况是，因为“易写”，创作队伍会呈现出大众普遍参与的状态，即“大众性”；因为“难工”，创作队伍更需要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作家，即“专业化”。相较其他体式小说而言，微型小说呈现出强烈的“技术美”。技术是一篇优秀微型小说文本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构成一篇优秀微型小说文本的直接成因。微型小说的“易写难工”特性决定其需要“工匠精神”，即这一文体需要用更微小的文本质量，激发更深刻的意义裂变。这就是我强调的微型小说创作既呈现出强烈的“技术美”，更需要“专业化”写作的原因。

微型小说能不能反映大时代，如何反映大时代，是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根据个人的理解，我认为所谓时代，时者，指的是自然层面的流年运转；代者，指的是社会层面的人事更替。时与代组合起来，反映了自然循环与社会变革交相映照下的社会状态。大时代的语义指向应该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发生重大变革、转型、重构的关键时期。小说要反映大时代，应该不是一个轻松的命题，微型小说尤甚。不论是出于微型小说的文体担当还是文体焦虑，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创作实践上看，长篇小说如《子夜》《山乡巨变》等，都是反映大时代的力作。微型小说虽然只有一千多字，但也有类似的作品，如作家戴希的《死亡之约》、您创作的《明星班趣闻》等，都反映了大时代下的一个生活切片。

文学创作是否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或者变迁，不在于文字的多少，而在于作者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唐代诗人杜甫的《石壕吏》仅有120字，“其事何长，其言何简”；法国作家哈巴特·霍利的《德军刺下来的东西》，全篇也不到200字。两篇作品均以微观视角反映了社会的宏阔和深远，其广度与深度达到了不亚于鸿篇巨制的效果。这些经典作品昭示我们，微型叙述反映大时代，在于其“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事张力。微型小说需要从“大而全”转变到“小而新”，这涉及微型小说写作范式的转换，需要作家具备匠心和智性。长篇小说以“全景式”的写作来反映时代的变迁，而微型小说更多的是以“特写式”的白描来反映生活的变化。

微型小说有利于迅速地反映时代新变，关键在于作者对生活感受的敏感度，能够及时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家从维熙的微型小说《爱的墓园》，通过“窥探”这一微小切口，剖析时代背景下的人性真实，以微观视角反映人在时代中的浮沉。从这一层面上说，微型小说的文体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既微观又宏阔，有滴水藏海、见微知著之巧；二是既松散又稠密，有以一当十、以象达意之美；三是既简洁又丰富，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妙。虽然说微型小说更多的是微观视角下的“私人叙事”，但众多的“私人叙事”形成合奏，就是时代的宏大乐章。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微型小说的“以小见大”。

安 谅：您说得对。实际上，短叙事要获得生命力，关键在于紧扣时代脉搏。在我看来，短叙事的选题应注重“烟火气”，从社会生活的细微处切入，不贪大求全，而是以敏锐的创作触觉捕捉真实，同时不断提升对题材的把控力，找到恰当的叙事角度，进行艺术化呈现。表达时须拿捏分寸，避

免直白显露，也不必虚张声势，让作品的“时代性”在品读中自然浮现，意蕴悠长而耐人寻味。

“短距离”聚焦

高 健：刚才我们谈的微型小说能不能反映大时代、如何反映大时代，更多的是从宏观的层面、从认识论的角度去审视这一问题。现在我们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谈微型小说反映大时代的实践路径。在谈方法之前，我觉得还要谈一下能力。

宋人王辟之撰《渑水燕谈录》写了这样一则典故：几位史官需要给一位贵侯立传，但这位贵侯出身贫贱，年轻时曾干过杀猪的营生。几位史官为此犯了愁：写了犯忌讳，不写又违反实录的规矩。找到吏部侍郎胡旦，胡旦说，为什么不说他“某少尝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直陈其杀猪谋生，似对贵侯不敬；埋没史实，有违职业操守，于是方有将杀猪转换为“宰天下”的艺术处理。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文字记载与生活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文学是艺术想象与现实加工的产物，更是如此。我想，所谓作家，就是具有将俗常生活转换为文学文本能力的人，他们以自己的作品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

除了把现实转换为文学的能力，作家还需要有聚焦生活的能力。有的作家擅长“长距离”叙事，有的作家惯于“短距离”聚焦。如于德北的《杭州路10号》，以一个颓废青年的奇特经历，完成一次心灵的洗礼。看似荒诞的事件，其实是以“事赝而理亦真”的故事，达成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这是一篇“长距离”叙事。而像您的微型小说《司机老马》，可视为“短距离”聚焦，人物、事件、场景贴着我们的生活，写的就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短距离”聚焦要注意的一点是，要避免社会热点拼贴，或避免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要经过“提纯”和“蒸馏”。

安 谅：微型小说属于“螺蛳壳里做道场”，篇幅短小，但紧凑而充实，要让读者品读有味，结构布局需要精心设计。有时要在精短的篇幅里，表现某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故事，如果不剪裁得当，不进行深度提炼，是难以出精品的。这需要反复锤炼。所以，我常以“萃取”一词来表达这一过程，其实也就包含了您说的“提纯”和“蒸馏”的意思。

微型小说创作应该不局限于某个固定结构，而是努力探索符合逻辑而又一波三折的故事叙述，从而让小说引人入胜，也更富有情趣，立意更为深刻。同时，好的小说不能平铺直叙，一定要有隐喻，如同诗歌要有某种意象一样。

高 健：微型小说作为一种特别讲求空白艺术的叙事文体，它巧妙地利用文本外的留白与省略、文本内的蕴藉与多义，为读者创造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作家引导读者深入文本之中，感受那些未被言明却意味深长的部分。这就是微型小说的“不叙之叙”。这种“不叙之叙”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层次，更激发了读者参与创作、让探索欲望得以释放的快感。

所以，微型小说的这种阅读审美特征，特别需要读者的参与。相对简约的文本恰如“静水”，潜伏着浓郁的意蕴“流深”，字里行间氤氲着超越文本的言外之意。相较于其他体裁的小说，微型小说更需要耐心的读者，更多地要求读者能够读出作者隐含的叙述，进而去反观自己，将其作为生活的镜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微型小说既是一种隐喻性特别强的文体，也具有很强的介入现实的能力。

大时代下的微型小说如何自处，作为最近“实用文体”的小说体式，当下的微型小说多为介入型写作，不仅是故事的载体，更成为观察时代的多棱镜、参与公共讨论的轻骑兵。

安 谅：应该承认文学的社会功能，但强调“潜移默化”优于说教。小说不是教科书，应该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有所获得。

高 健：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左传》中评述《春秋》时曾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文以载道，于委婉叙事间完成价值传递，其实这是包括微型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的共同追求。

微型小说以高度凝练的叙述语言和迅速展开的故事情节，较好地契合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碎片化阅读和快节奏信

息消费，满足人们快速获取文学滋养的需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微型小说的文体价值因时代的强烈需求而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刚才我们提到的微型小说的介入型写作，是从其社会功能来考量的。

我认为，微型小说的创作实践，还可以从文体功能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创意写作的探索。其文体灵活性、超现实手法及跨界融合，激发文学形式的创新。二是精致写作的探索。在方寸间制造审美张力，于细微处见精神意蕴，赋予文本超越自身的艺术生命力。三是个性写作的探索。突破传统叙事范式，通过细腻独特的个体呈现，让微观叙事承载普遍思考，实现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审美辉映。我们探讨的短叙事如何反映纷繁的时代，更多还是聚焦其文体的社会功能。因此，我认为，文学要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微型小说不仅可以承担，而且具有独特的文体功能的优先。

安 谅：在数字化时代，微型小说从文本创新到表现形式，都有了新的可能。但是，创作者也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既要守住文学作为人学的本旨，也要正视并关注依托于网络平台的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兴艺术形式。网络热梗也是一种新时代生活的新现象，能折射出社会上的某种普遍情形和心态，可以吸纳到文学创作中。

高 健：确实，人类信息传播媒介迭代到数字化时代，篇幅精短的微型小说恰逢其时，其生产、传播与消费均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重构。这种媒介变革既为微型小说开辟了多维发展空间，也激发了微型小说的创作活力，大量的新生代作者群体加入进来。可以说，数字媒介正在重塑微型小说的文体意义。就微型小说的数字化传播量来说，早已超越其他体式小说。媒介嬗变带来的不仅是传播方式的改变，更是文学生态的重构。这些现象昭示着微型小说已突破“补白文学”的定位，而演变为承载时代情绪的“精神美食”。应该说，微型小说是与新兴媒介融合较好的文体，这使它更有机会孵化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可能。

时代的“切片”与人性的“标本”

安 谅：“微型小说是时代的‘切片’，更是人性的‘标本’。”我常说，微型小说里有定力。以这种文本为镜，甚或手术刀，坚持不懈地去映照生活，去解剖时代的内在肌理。微型小说是生活的片段和瞬间，是用文字汲取和提炼的生活的极精短的一部分。这千余字本身，既可以囊括天下，也能洞察人生。它也许微小如豆、细短如丝，能分秒读完，但字里行间有大悟，有大气，即便是信手拈来的生活的短小篇什，也有睿智，有意蕴，有心领神会的一悟，有深为感触的一笑。以小博大，见微知著，立意高远，恰是微型小说的气象万千。每个时代都自有其特征，微型小说能以一滴水去映照这个时代的某一个光点、某一种精神和某一片色彩。

高 健：正如科学技术在当下的飞速发展一样，当代文学也在以自己独特的姿态开辟着文学发展的新路径。当然，微型小说的创作实践正以个性化的艺术探索参与这场文学变革。在考察这一文体形态的特殊发展轨迹时，需要将其置于宏观文学视域进行观照——它既不是孤立于其他文体的异质存在，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现象，而是折射着时代精神嬗变与审美范式转型的微观样本，其艺术形态的嬗变本身便构成了当代文学整体发展的活性基因。

我们正处于一个纷繁变化的时代，当下的微型小说正孕育着从文体意义上文学精神重构的可能性。微型小说的未来在于创造更加独特的自己，与其他文体一起装点新时代璀璨的文学星空。

微型小说何如？最终还是要以作品来说话。

回到我们探讨的话题本身，短叙事如何反映纷繁的时代以及大时代下的微型小说如何自处，是值得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讨论和思考的话题。包括我们在内的微型小说作家，正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着回答。

以上这些不一定切题，只是一些零散的感想，期望能引起文学界同仁更多的思考。

(作者安谅系作家、评论家，高健系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反映时代变化并及时回应新课题，是文学的使命。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既需要勾勒大时代的波澜壮阔，也应照见平凡个体的万家灯火。近期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诸多新作在回望历史与表现当代图景时，以兼顾大历史与普通人的叙事策略，记录时代变迁，同时也彰显了在宏大气象与人间烟火之间的人性光辉。作家们既书写了历史进程如何影响个体生命，也表现个体行动如何构建历史，对“文学是人学”这一经典命题作出了回应。

在历史的深处，许多作家没有着重刻画烽烟战火与英雄传奇，而是以小切口书写大事件，在历史中看见具体的生活，聚焦战争年代普通人的淳朴情感。黄军峰的《愤怒的麦苗》(《长城》2025年第5期)没有着眼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或运筹帷幄的将领，而是将目光投向平凡的农民。农民们紧攥锄头守护庄稼、与敌人抗争，正是家国情感最朴素的表现。邢庆杰的《白光》(《中国作家》2025年第3期)以鲁西北的风俗人情为底色，不讲述完美的英雄传奇，而是刻画草根英雄孙振江的成长。李朝德在《寻找道格拉斯》(《中国作家》2025年第7期)中，追忆超越地域界限的抗战精神，向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先辈致敬。王新军的《庙沟地铁事》(《四川文学》2025年第3期)回忆爷爷的一生，在表现战争年代人们为生计而努力的同时，穿插了偏远的庙沟地百姓对长征以及抗日战争的认知的变化过程。史明琦的《珞山行》(《中国作家》2025年第1期)以时空交错的设定，让几位现代社会的大学生在一次探险中阴差阳错地进入过去时空，并意外改写了一段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面对当下乡村振兴、地域融合、文化传承等命题，作家们不断捕捉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守、适应与逆袭。梁弓的《淮水汤汤》(《山东文学》2025年第10期)描写回乡建设者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并向不在建设现场的默默付出者致以敬意。钟正林的《过山沟》(《四川文学》2025年第8期)写主人公上任后遇到的一系列小问题，展现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也刻画了村民淳朴的内心世界。李铁的《刺槐》(《中国作家》2025年第5期)将目光投向乡村开发与生态保护中籍籍无名的奉献者，替“为众抱薪者”发声。

很多作家关注民族地区如何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真实情感。李刚的《下山》(《四川文学》2025年第3期)体现了作者对易地搬迁后续问题的深入思考；杨逸在《远方有所寄》(《四川文学》2025年第5期)中关注到援疆教师在责任感和亲情之间的拉扯，也写出了哈萨克族少年努力读书渴望逃离故土的同时对家族心怀愧疚的复杂心理。在《牧人与头羊》(《中国作家》2025年第2期)中，舒洁以几代牧民的家族故事为线索，表现人对故乡难以磨灭的情感羁绊。杨志军的《尼玛村今天选举》(《中国作家》2025年第1期)在村民们幽默的对话中展现了热闹喧哗的选举大会，会场上现代规则和传统习俗的碰撞与融合，是村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基层治理的写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深刻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独特而鲜明的精神气质，是许多作家重点关注的内容。关仁山的《太阳照在滹沱河上》(《中国作家》2025年第6期)以常山战鼓的传承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出路，探讨乡村如何寻找自身发展道路的深刻主题。夏立楠的《大相》(《中国作家》2025年第3期)中，薛一山因花灯戏获得生计、遇见爱情、受到尊重，在失明前传承了花灯戏的衣钵，实现了一直以来的心愿。李谦的《秧歌年》(《四川文学》2025年第1期)从秧歌队两大主力要求辞职转行写起，展现秧歌队的兴衰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故事最后不计收益的表演，也为秧歌队的使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王良瑛的《观灯》(《山东文学》2025年第3期)写剧团改制后茂腔名角赵美玲因离开舞台而意志消沉，但对茂腔的热爱让其重组班子寻回自我价值，在让茂腔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巧妙地化解了两个姓氏的世代隔阂。作家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思考没有落入挽歌式的窠臼，而是发现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大新生力量。

此外，作家们也关注平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悲欢浮沉，展现其个人命运与历史变迁的同频共振。张中民的《天河镇》(《四川文学》2025年第10期)中，高天佑回乡创业屡遭打击，但他没有一蹶不振，在故事的最后与爱人一起离开天河镇踏上新的奋斗旅程。盛夏的《春风十里》(《山东文学》2025年第7期)中，穆惠兰从因“贪吃”被嘲笑到钻研厨艺开办饭馆，实现了农村女性的逆袭，而创业成功后洒脱关店的选择，更预示着普通人已经逐渐从物质生活的富足转向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张鲁镭的《南山首府》(《中国作家》2025年第1期)中，梁粉与罗卜夫妻二人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乐观，对“南山首府”的向往并非源于物质欲，而是普通人对未来生活的期许。魏思孝的《好汉们》(《雨花》2025年第1期)为一群小城文艺青年作传，揭示了当代普通青年的生存状态。在表现时代影响下的个体命运时，作家们无一例外地看见了人在时代洪流中进行自觉选择的主体性。

纵观近期文学刊物新作，不难发现，作家们在书写历史时，始终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塑造的是有主体性的个体，在为人民代言时，保持平视的姿态，真诚倾听，朴素共情，既书写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也表现英雄主义。作家们带着描绘波澜壮阔时代的笔力与洞察人间烟火的耐心，看见了万千气象中的百态人生。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评论

平实与鲜活

——评张昆华散文集《林徽因的龙泉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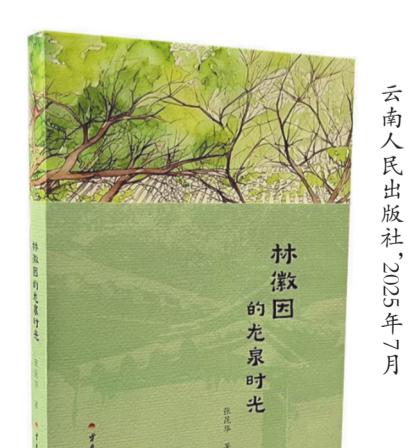
□张运贵

作家张昆华81岁高龄后，仍然笔耕不辍，连续出版了两部散文集《香格里拉草原上》《冰心的木香花》和一部评论集《文学的美感情感》。至今，他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40余部，可谓成绩斐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散文精选集《林徽因的龙泉时光》中收录的大都是他晚年的代表作，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读完之后我深深感到，无论其思想价值还是艺术魅力，都展现出了较高的水准。

散文家秦牧曾说，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仓库：生活的仓库、知识的仓库、语言的仓库。张昆华的生活、知识和语言仓库的库存非常丰富。无论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品，凡是

涉及历史、文化、诗词、传说等，他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散文集的历史性、文献性、文化性、学术性较为突出，有多篇写到中华历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郑和、徐霞客、林则徐、李鸿章、蔡锷、唐继尧等历史名人。张昆华把生活现实、史迹、文化内涵、人物性格、科学考察、史海钩沉等有机结合，使作品内容厚实、内涵丰富、线索鲜明、细节生动。尤其是在与文集同名的散文《林徽因的龙泉时光》中，作家以平实的语言记叙了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人的动人往事，讲述他们之间的文人交往与惺惺相惜，从侧面展现当时中国文坛鲜活的文化氛围，读后让人久久难忘。可以说，张昆华的散文集对史实的记



叙、对知识的介绍、对历史的钩沉和对人物事迹的考证方面，都做到了严肃认真、细心求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从阅读中，我们可以回顾张昆华70余年的创作历程，感受散文的平实与鲜活。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宏阔气象与人间烟火

《中国作家》《长城》《雨花》《山东文学》《四川文学》：